

郭 預 衡 著

世 後

歷代散文叢談

散 文

歷代散文叢談

歷 代

腸胃  
爲表裏誤移於  
于太陰之靈與  
殊不知以理  
至

## 序 言

中国历史悠久，散文遗产丰富。书名《历代散文丛谈》，其实谈的并不全面。有些地方还没有谈到，未免名不副实。虽然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名实相副者本来不多，一个书名，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我还是愿意作些补充，概括谈谈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，作为本书的序言。

这里且从殷商谈起。

殷商时期的散文，就《尚书》里的“商书”来说，可靠的只有《盘庚》三篇。这三篇文章虽然不无后来增益的成分，但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面貌，具有当时文章的特点。这特点是什么呢？曾经有人认为，其中用了很多比喻：“若颠木之有由蘖”，“予若观火”，“若网在纲”，“若农夫服田力穡”，“若火之燎于原”，“若射之有志”，如此等等，很富于形象。但富于形象，乃是先秦散文共同的特征，殷商之文还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？一经比较，我以为殷商散文，以《盘庚》而论，是有自己的特点的。这特点就在于：“恪谨天命”，“勉出乃力，听予一人之作猷！”从这些话看，特点就是靠天发令，简单命令。这一特点是和殷商的政治状况有关的。当时正当奴隶

主专政的盛世，有恃无恐，发号施令，比较简单。

到了周朝，文章的特点有了变化。拿《尚书》的几篇“周书”来说，就不仅是靠天发令了。周公告流戊王的话，都是谆谆教诲，以《无逸》而论，其中虽然也讲天命，却更多地讲到了人事，讲“保民”多于“敬天”，特别是常讲以殷为鉴，讲君子要“先知稼穡之艰难”，如果“生则逸，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是从”，那就有亡国的危险。西周的几篇造命之文，主要特点就是善于说教，用历史经验说教。这一特点也同西周的政治状况有关。西周虽然也是盛世，却已看到庶民可畏，因此，造命之文，谦恭戒惧，不像殷商那样简单。

到了春秋之世，文章的特征又有变化。这时王纲解纽，政在诸侯，诸侯相争，不仅靠打仗，还要靠外交。于是大夫行人，尤重辞令。《左传》一书就是记录了大量的外交辞令的。其中最突出的是郑国子产的辞令。当时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，子产身为执政大臣，左右应付，相当困难。但也正是在这困难的条件下，他出色地进行了外交活动。虽然不能以武力克敌，却往往以口舌制胜。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，“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”。他的辞令曾经得到当代权威人物孔子等人的称赞。正是这样的辞令，成了《左传》文章的重要特征。当然，这时善于辞令的不止子产，也不止郑人。但郑人善于辞令，最为突出。还有一个邓析，也是郑人。此人能“操两可之说，说无穷之辞”。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洧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溺者。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之，其人求金甚多。以告邓析。邓析曰：“安之，人必莫之卖矣。”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。邓析又答之曰：“安之，

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”

这是说，卖尸者索价甚高，买尸者向邓析请教。邓析说：“没事，你不买，他卖不出去。”卖尸者也向邓析请教，邓析又说：“没事，他不买，别处也买不到。”这大概就是“两可之说”，“无穷之辩”。但可惜的是，邓析的著作已经失传，否则，他的辞令一定相当可观。

到了战国，文章的特点变化更大。百家争鸣，驰说云涌。

“家扶飞钳之术，人持弄丸之辩”，诸子百家，无不长于辩论。孟子是号称“好辩”的，他自己也不否认。至于纵横家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之流，其逞辞善辩，更不待言。由于争鸣和论辩，语言的表达能力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例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有这样一段：

啜菽问乎王倪曰：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”

曰：“吾愚乎知之！”

曰：“子知子之所不知耶？”

曰：“吾愚乎知之！”

“然则物无知耶？”

曰：“吾愚乎知之！虽然，尝试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？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？……”

象这样的文章，在运用语言的艺术方面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有人说庄子之文是说辩，我以为不然。正是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战国之文长于论辩的突出的特点。

战国之后，是秦的一统天下，但“秦世不文”，这里可以不论。

到了汉代，文章的特点又不到了。汉朝的一统天下，长达数百年之久，其间文章不无变化，想用只言片语概括其特点，

当然有些困难。但我仍然觉得，其主要特点也有两个。一是歌颂，一是牢骚。歌颂包括讽谏，牢骚包括诽谤。古来有句联语说：“西汉文章两司马”。我以为，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正是代表了汉文特点的两个方面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固然是歌颂，《封禅文》更是歌颂。至于有所讽谏，那是曲折委婉。司马迁的文章，不仅《报任安书》是牢骚，全部《史记》都充满着牢骚。前人说是“谤书”，没有说错。当然，《史记》也称“实录”，但要知道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“实录”就是“谤书”，说实话就是诽谤。汉代文章产生这样两个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，尤其是在汉初，当战国纷争、秦政烦苛、楚汉相持之后，大乱之余，人心思治。作者秉笔为文，态度都很积极。歌颂固是效忠皇朝，牢骚也并非忘怀世事。真正消极避世者，没有牢骚。

到了魏晋，文章特点又自不同。汉魏之际，魏晋之际，晋宋之际，“通脱”、“清峻”，“师心”、“使气”、“和平”、“平淡”，表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，显示了不同的艺术特征。最能代表此期文章特点的作者嵇康、阮籍和陶渊明。阮籍写过一篇《大人先生传》，有人说其体出自汉人的“设问”，其实不然。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。”“无贵而贱者不怨，无富而贫者不争”。嵇康有一篇《太师箴》，应该是讲一些大师的供职之道的，但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刑本惩暴，今以胁贤。昔为天下，今为一身。下疾其上，君猜其臣。丧乱弘多，国乃隳颓。”阮、嵇二人的这类文章都可以通向鲍敬言的“无君论”。当然，陶渊明的文章是写得和平的。《五柳先生传》、《桃花源记》，都可谓平淡得很。但是，仔细推敲，则“无怀氏之民”，“葛天氏之民”，

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如此等等，也就近于“无君”了。

到南北朝，文章更崇骈偶，从形式看，当然也是特点。但从实质来说，骈偶只是形式，特征不在此。所谓“六朝文”者，突出的特点，在我看来，恐是文人之“无特操”，行文之“无拘忌”。最有代表性的作家，我这里且不举江鲍徐庾，而偏举一个张融。张融曾说自己的文章“不汗不陌，非涂非路”，“无师无友，不文不句”，可是“颇有孤神独逸”。这样的文章究竟如何呢？他有一篇《遗令》，可以为例。其文云：

吾平生所善，自当凌云一笑。三千买棺，无制新衾。左手执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，右手执小品《法华经》。妾二人，哀事毕，各遣还家。

这样的文章，正如其人，“不可无一”，亦“不可有二”。虽然不能代表六朝一切文章的特点，但从“无特操”、“无拘忌”看，则相当典型。

六朝以后，文章要推唐宋。唐宋所作，号称“古文”。这时的古文家大抵都是固好古人之道而为古人之文的。后世所谓“文以载道”，当然可算新的特点。但在我看，唐宋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是“载道”，而是好发议论。这是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些关系的。唐太宗的政策比较开放，宋太祖更加优待文臣。台谏可以风闻言事，文人可以制策得官，而很少（不是没有）以口舌得罪。因此，许多作者都遇事敢言，形成文字，也就长于议论了。有的作者，不仅长于议论，而且散发狂言。在唐宋两代，出过几个狂士。首先一个是元结。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，此人“性不谐俗”，“迹涉谗激”。自称“浪士”，又称“鸬鹚”，或称“漫郎”。颇近古之狂生。所为文章，狂而且迂。其《处规》、《出规》、《恶圆》、《恶曲》，都是

这得可以的。后起的古文大家韩愈，也是遇事敢言，发为文章，不免狂妄。其《论佛骨表》，就是相当狂妄的文章。到了宋代，以狂见称的有柳开。作《补亡先生传》，自命为圣人。叶适就说他有“蕲觊未涉之狂气”。柳开之外，王禹偁、尹师鲁，都以议论见称。至于一代大家欧阳修，其“果敢之气，刚正之节”，也都是“见于议论”的。还有，宋人之好议论，不仅在于论说之文，有时游记之文，如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，也几乎通篇议论。这是一时风气，有人说是缺点，我则看作特点。

金、元之文，大抵师承两宋，有成就却没有多少特征。

明人之文，出现特征，也在晚期。在早些时候，无论是前七子、后七子，唐顺之，归有光，也无论是法家汉，学欧者，都还不算自己的特点。七子、归、唐，非无成就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尽管要载古人之道，写古人之文，而古人之道已被唐宋作者写完了，古人之文也被唐宋作者写完，他们已经无道可载、无法可说了。

正当无道可载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“性灵”。于是“独抒性灵”，成了一代风气。此风一开，也就有了特点。所谓明人“小品”者，尽管有些只是“小摆设”，却也是前世少有的。

到了清代，文章的特点，不大好谈。接二连三的文字狱，要写文章，不但无道可载，连明人那一点性灵也没有了。这时期有些文人学者，不作“代圣贤立言”的“八股”，便做名物训诂的学问，讲“汉学”，讲“宋学”，做考证，虽写文章，也总不能算是自己的特点。这时可以勉强算作一代特点的，恐怕还是桐城派的文章。桐城派作文法是讲究“义法”的，按照“义法”写出来的文章究竟应该什么模样，我不很清楚；我只

看到，他们的功力很深，文章写得十分工整，没有什么毛病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，大概可算典型。人们知道，方苞是受“南山案”的牵连入狱的，“身非木石”，未必好受。如果是司马迁，不知要发泄多少愤激和不平。但在桐城义法的指引下，方苞的文章竟写得如此矜慎，好象他只是个旁观者，连一句牢骚都没有。这一点实在难能。

在清代，这样的文章大概是最合时宜的了，炉火纯青，这当然也应算是一代文章之特征。

但是，文章作到这个地步，有如蜡制美人，也就没有多少生气了。于是物极而反，到了近代，文章便发生了更大的变革。最先发生的，是梁启超的“新文体”。其特点是“纵笔所至不检束”，是“笔锋常带情感”，一反桐城义法。这样的文章，在当时的影响曾是不小的。不过，梁启超也是一个先行者，先行者常不免于简单片面，再说，此公思想又曾一度逆转，从维新转向保皇，一开倒车，这样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。

但文章的变革是一发而不可收的，到时代的变革，是“五四”的散文和文风。这方面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不少，此处不再多谈。

1985年5月1日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言.....             | ( 1 )   |
| 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之文.....  | ( 1 )   |
| 史家之笔 策士之辞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之文..... | ( 10 )  |
| 《左传》的思想和文章.....     | ( 19 )  |
|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.....      | ( 35 )  |
| 秦汉文章之变迁.....        | ( 57 )  |
| 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司马迁行文的特征.....     | ( 80 )  |
|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.....       | ( 87 )  |
| 汉赋的发展、变化和特征.....    | ( 108 ) |
| 六朝文说·总叙.....        | ( 121 ) |
| 八代文风和曹操.....        | ( 140 ) |
| 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.....     | ( 146 ) |
| 六朝文三题.....          | ( 151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北朝文三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188 ) |
| 杰出的散文家韩愈·····          | ( 210 ) |
| “谀墓之文”和“以文为戏”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韩文异议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230 ) |
| 从元结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·····      | ( 236 ) |
| 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·····         | ( 243 ) |
| 欧阳修的文风、学风和书风·····      | ( 268 ) |
|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读欧阳修散文随笔之一·····      | ( 274 ) |
| 读欧阳修的《论尹师鲁墓志》·····     | ( 284 ) |
| 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·····       | ( 294 ) |
| 行云流水 姿态横生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读苏轼散文随笔之一·····       | ( 306 ) |
| 苏轼《教战守策》的论说艺术·····     | ( 313 ) |
| 曾巩为人和为文的特征·····        | ( 320 ) |
| 金元散文简论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327 ) |
| “前七子”的复古与“何景明”的文风····· | ( 362 ) |
| 归有光文章别解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369 ) |
| 从王阳明到袁中郎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明代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·····     | ( 377 ) |
| 桐城派的理论和实践·····         | ( 392 ) |
| “五四”散文与文风·····         | ( 411 ) |
|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·····         | ( 426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千古文章重“白描” .....        | ( 433 ) |
| 汉语文章传统的语言特征和风格特征 ..... | ( 437 ) |
|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.....       | ( 454 ) |
| <b>·附编·</b>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从《周易》到《庄子》 .....       | ( 475 ) |
| ——先秦玄理之文的发展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唐初政治与文章 .....          | ( 499 ) |
| 武周治下的文章 .....          | ( 520 ) |
| 柳宗元的人品和文品 .....        | ( 540 ) |
| 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 .....        | ( 576 ) |
| ——《南宋文范》校点本序言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汉宋儒学与文章 .....          | ( 602 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619 ) |
| 附记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621 ) |

## 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

### ——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之文

先秦诸子之文，在当时成就最高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，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。“东鲁春风‘吾与点’，南华秋水‘我知鱼’”，讲的就是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的文章。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章学诚所说的：“深于比兴”，“深于取象”。（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下》）也就是善于运用比喻，能够引物连类，阐明道理；即使是讲抽象的理论，也都富于形象。不但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，（《易教上》）而且很少离开形象而说理。理论富于形象性，本是先秦散文的一个共同的艺术特征，而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又有突出的特点。

《论语》是先秦儒家的主要著作。书中主要是记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，据说是孔子死后，“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，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。

孔子是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中一个最有影响的改良派。在政治上，有人说他是复辟奴隶制的，但当孔子在世的时候，奴隶制还没有真正瓦解，因此，与其说是“复辟”，还不如说是“改良”。因为，从他所表述的政治理想看，他不是简单地恢复商周的旧制度，而是要有所“因革”、有所“损益”的。他

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，政治理想是“仁政”，用“仁”来缓和阶级矛盾，用“仁政”来挽救奴隶社会的灭亡。这种思想在《论语》一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。

从思想实质说，《论语》一书、特别是其中一些论政的文字，是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；但孔子不仅是个政治上的改良派，他又是个多才多艺、很重视辞令、说过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的人，因此，《论语》一书，在表达思想的艺术上就很有特点，非常富于文采。有的语言极为凝练，富于形象，且含有哲理。例如《子罕篇》记载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’。”就是很有特征的语言。虽有大量的说教，但不是板着面孔说教。有的篇章很带感情色彩。例如《季氏篇》讲季氏将伐颛臾，冉有和季路去见孔子，说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一听便道：“求，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？”冉有说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于是孔子更发怒道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再往下，孔子更为激动，文章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。此外，有的篇章还能够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的故事之中。不仅形象鲜明，而且情节生动。其中最完整的例子是《先进》篇里的“侍坐”一章。

这一章写的是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孔子首先发问，说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这是让四个学生各言其志。

子路比较直爽，马上对答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

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孔子听罢微笑。然后又问冉有和公西华。两人回答，孔子没有表态。最后，问到曾晰，文章是这样写的：

“点，尔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伤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”

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“东鲁春风吾与点”，指的就是这段文字。在这里孔子赞许了曾晰（点）的话，但孔子赞许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曾晰说的几句话，全是“取象”，并未说理，其含义和子路等所说有何不同呢？对此，历来的学者曾有不少分歧的解释，这里不必多说。我认为曾晰的这番话是用一幅太平无事的景象来表达一种生活理想，从而暗示了他的志向。孔子在战乱的年代中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太平的社会生活，因此，一听曾晰的话，便立刻表示赞同。

当然，这样的社会生活不是可以坐而等待的。其实现还要靠政治活动。因此，孔子赞成曾晰的志向，却也并不否定子路等人的志向。当曾晰问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”时，孔子的回答是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那么，为什么笑子路呢？孔子说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很清楚，孔子并非笑子

路讲“为国”，而只是笑他“不让”。因此，当曾晰弄不明白而又再三提问时，孔子便又反复作了解释。

这段文章近来也曾有人认为是表达了孔子晚年消极避世的思想，我看不是。孔子的政治态度始终积极，这是他为人一贯的特征。孔子和他的门人虽然也说过行藏取舍的话，如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（《述而》）之类，但孔子的“藏”，不等于消极的“隐”，而是等待时机，志在守“道”。这里说的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”，其所作所为，也绝非隐者的行径。对于隐者、对于避世者，孔子及其门人是自有看法的。这在《论语》一书中也有专章描述。例如《微子》篇写长沮桀溺耦而耕一章：

长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

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。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耒而不辍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，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长沮桀溺是何许人？前人的说法很不一致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叙此事于孔子去叶反蔡之时，好象长沮桀溺实有其人，而子路问津也实有其事。金履祥《论语集注考证》说：“长沮桀溺名皆从水，子路问津，一时何自识其姓名？谅以其物色名

之，如荷蓑、晨门、荷蓑丈人之类。”后来俞樾也有类似的说法。这虽然否定了长沮桀溺是真名真姓，可是仍然肯定确有其事其人。

依我看，这段文章恐是虚构。不仅长沮桀溺并非真名真姓，就连其人其事也未必实有。《论语》的编者为了表达儒家主张积极用世、反对消极避世的思想，于是便“取象”于长沮桀溺，假借他们的言论，发表自己的主张。一问一答之间，对于避世的思想进行了巧妙的驳斥。

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云云，我看也不是随便一说，而是有所针对，很可能是针对庄周一派讲的。庄周一派是主张“同与禽兽居”（《马蹄》）的，而孔子不然，他是不肯离开“斯人之徒”而避世的。“斯人之徒”指哪些人呢？我曾晰所说的那“冠者五六人、童子六七人”，大概也就都在其内。

司马迁给庄子立传时，曾说《庄子》一书“大抵率寓言也”，其中“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”。这话说得不错。但可惜，司马迁对于《论语》的个别篇章却没有提出类似的看法。其实，长沮桀溺何尝不是畏累虚，亢桑子一类？这些人物，可能都是“子虚”、“乌有”，都是孔门后学行文之际、“深于取象”而虚构出来的。

在先秦诸子中，最“深于比兴”、“深于取象”的文章，还得首推《庄子》。《庄子》一书包括内篇外篇和杂篇。有人说内篇是庄周自著，外杂各篇出于后学之手。其实古人著书，师徒相继，本来不必出自一人，成于一手，才算一家的著作。今天看来，尽管全书思想比较驳杂，文风也不尽统一，但有一点



是共同的，即大量地运用寓言、运用形象说理。这是《庄子》文章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。

庄子也是奴隶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但他和孔子不同，他不是积极用世，而是消极避世。对于当时濒于灭亡的奴隶社会，他不是力图挽救，加以改良，而是愤世嫉俗，全身自保。孔子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他是知其不可而“无为”的。他的思想和老子也不同。《老子》一书虽然也主张“无为”，目的却在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；而庄子，则是真的愤而不了了。

象这样的人物是不是真的隐者呢？按照鲁迅先生的看法，真正的隐者是没有文章的。他们既然写出文章，可见也还没有真的忘掉人世。他们对于人世大概怀着很多不满的情绪，而又“以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，于是就发为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形成了“瑰玮”、“参差”、“谲诡可观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的文章了。

一篇《逍遥游》，是《庄子》文章的代表作。关于这篇文章的思想，从古到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诠释，但我的看法比较简单，我以为分析思想，不能离开政治。这篇文章不管它“取象”多么离奇怪诞，而根本思想则不过是要在乱世之中求得逍遥，此外别无深意。这种思想也不是难于理解的。这乃是庄子这流人物在战国时期饱经篡乱之后、于无限愤慨之中得出来的处世之道。当然，其所追求的“逍遥”，在人间世里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，只能设想于“无何有之乡、广漠之野。”这当然只是一种想要摆脱现实的幻想。

这种摆脱现实的幻想是产生于对于现实的否定。这篇文章认为现实是不可为的，对于“知效一官、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、而征一国者”，是很看不起的；对于“尧治天下之民，平